

中国历史 学年鉴

简 本



1982

K2-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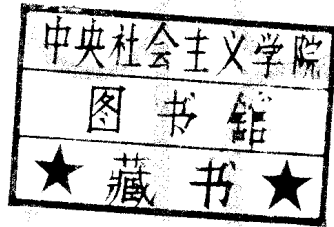
50854



200414907

中国历史学年鉴

简 本



人 民 出 版 社



编辑者:

李 侃 (中国史学会)

林言椒 (人民出版社)

王庆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叶青谷 (文物出版社)

陈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陈高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封面设计: 钱月华

中国历史学年鉴

(1982年版, 简本)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5.625印张 577,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

书号 11001·514 定价 2.00元



卷头语

1

史 学 研 究

中国古代史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王思治	3
先秦史	周自强	17
秦汉史	张荣芳	26
魏晋南北朝史	胡守为	刘志飏 38
隋唐五代史	卞孝萱	郑学檬 46
宋辽金西夏史		沈起炜 54
元史	周良霄	韩志远 61
明史		郑克晟 69
清史		王宏钧 77
太平天国史	钟文典	唐 凌 85
洋务运动		姜 铎 93
戊戌变法		王晓秋 100
义和团运动		李德征 105
辛亥革命	赵矢元	段云章 112
现代史		陈铁健 123
先秦考古		殷玮璋 132
秦汉至明清考古		黄展岳 142
民族史	邓锐龄	马大正 153
科学技术史		杜石然 164
思想史		黄宣民 168
法制史		邱远猷 178
近代经济史		宓汝成 183
世界古代史	亭 云	际 陶 192
世界中世纪史		马克尧 202

目 录

NJ86/61

西欧近现代史	程西筠 孙 娟 209
美国史	杨生茂 218
苏联近现代史	孙成本 225
亚洲近现代史	俞辛焯 232
非洲近现代史	彭坤元 240
拉丁美洲近现代史	李春晖 杨典求 246

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工作的进展概述	孙思白 254
--------------------	---------

中国史资料出版介绍

中国历史古籍和专题资料的出版	魏连科 258
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出版	何双生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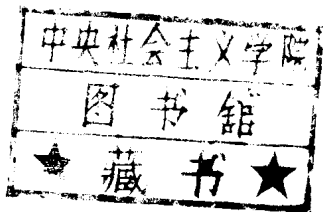
考古文物新发现

山东省沂源县发现猿人头骨化石	269	北京市铜厂从废铜中抢救出商代青铜器	273
内蒙古包头市发现阿善新石器时代遗址	269	北京市琉璃河商周遗址再次进行发掘	273
青海省民和县发掘一批新石器时代墓葬	269	陕西省宝鸡县高泉村发掘一批春秋墓葬	273
湖南省辰溪县首次发掘一处原始社会遗址	270	湖北随县发掘擂鼓墩二号墓	273
上海市松江发现新石器时代石犁	270	河南省淮阳县发掘战国晚期大型车马坑	274
云南省元谋县发现新石器遗址	270	秦汉栎阳故城遗址的考古收获	274
河南省偃师县发掘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台基	271	秦始皇陵区发现一批陪葬墓和刑徒墓	274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继续发掘	271	内蒙古包头市召湾发掘一座汉墓	274
甘肃省东部发现马家窑文化陶窑	271	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发现东汉末至西晋初墓群	275
内蒙古清理两座红山文化墓葬发掘了一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地	271	山西省太原市发掘北齐东安王娄叡墓	275
安阳殷墟发现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和一座车马坑	272	河北省临城县发现唐代邢窑遗址	275
陕西省武功县发现赵家崖遗址	272	西安市发掘唐大明宫两座宫殿遗址	276
山东省滕县前掌大遗址发掘四座殷墓	272	北京市丰台发现一座疑为唐史思明的墓	276
		上海古籍书店发现五代雕版菩	

萨像和宋蜀刻本	276	河南省开封市发现宋宫城和明	
湖北省钟祥县收得苏东坡端砚	276	周王府遗址	277
北京市八宝山发现一座辽代壁画墓	277	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遗址考察	
内蒙古集宁市附近出土一具辽代女尸	277	的新成果	278
西藏古格王国遗址考察工作结束	277	湖南省汝城县发现明代宫庭花轿	278
		江西省景德镇发现大批明代世俗建筑	278

书目、论文索引

中国历史新书、再版书书目	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	279
世界历史新书、再版书书目	世界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290
中国史论文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	292
世界史论文索引	《世界历史》编辑部	483



卷 头 语

我国历史学在健康、繁荣的道路上，载着可喜的收获进入了1982年。

1981年是中国历史学界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不论是对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也不论是对各种专门史的研究，都有了可观的进展。关于这一年我国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学术活动和学术讨论的状况，大体上都反映在1982年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里面了。

在进入1982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我国历史学的研究、历史课程的教学和历史知识的普及，都将有一个更深入、更繁荣、更广泛的进展。为了适应历史学发展的这一新形势的需要，1981年12月在天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着重讨论和确定了将于1983年春季举行的学术年会所要讨论的两个主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历史遗产。这两个主题，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和现实性。对于这两个问题进行切实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地讨论，不但可以更好地提高历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而且也会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把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科学地结合起来；把向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教育和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历史学的研究和历史课程的教学，开辟更广阔的途径和前景。

作为社会科学一个重要门类的历史学，必然要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阶级特点和民族特点。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学基础和优良的历史学传统。现在，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更美好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总结我们祖国的历史，撰写出许许多多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史学著作和史学论文，用祖国的历史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

2 卷头语

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历史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中国历史学年鉴》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逐年地综合报道和反映我国历史学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以及史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为历史学工作者和历史学的爱好者提供一种比较全面的和带有工具书性质的参考资料，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我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留下一个历史的记录。

1979年和1981年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是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出版以后，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许多人士的赞许和鼓励，同时也提出了不少需要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从1982年开始，《中国历史学年鉴》改由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负责编辑。这里应该感谢人民出版社的慷慨支持和大力协助。如果没有人民出版社在人力上的支援以及过去两年编辑《年鉴》的工作基础和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话，那末，1982年的这部《年鉴》是不可能这样顺利地出版的。

1982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和前两年的《年鉴》在内容和栏目设计上，除了增加世界史的内容和作了若干小的调整之外，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有许多同志建议《年鉴》要增加史学文摘和国外史学研究动态等内容，考虑到《年鉴》的篇幅有限，而且自发稿至正式出版的周期较长，为了比较及时地向读者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年鉴》编辑部从1982年起，另外编辑了《史学情报》(季刊)，以补《年鉴》之不足。

由于《年鉴》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很少，而且大都是兼职，加之理论学识水平和见闻都很有限，因此《年鉴》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一定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之处，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随时给以批评指正。《年鉴》创刊以来，得到史学界很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谨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

1982年2月

史 学 研 究

中国古代史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王思治

1981年来,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内,一些重大历史课题,仍然为大家所关注。讨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有:(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二)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三)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四)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少同志或着重东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或以大量的考古资料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见解,无论是广度或深度都有所进展,我们对以上问题的综述也将以此为主。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以往已为人们所注意。范文澜、翦伯赞、邓拓等早有专文探讨,过去不少文章都曾涉及这一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受到更大的重视。1981年发表的不少文章,不仅探索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具体原因,并

进而力求探明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现将几种不同的看法简述如下:

(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
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完成“封建化”过程

《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转载了《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刊登的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引起了热烈讨论。

刘昶认为,与西欧相比,中国没有完成封建化过程。西欧封建化是以农民农奴化、土地庄园化和政治多元化(王权衰落和封建割据)为其标志,在西方只经历了一次变更。然而,西欧封建化历史中的许多现象,在中国却反复出现,因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呈现出“六道轮回”的局面。周庆基概述这种封建化反复的局面说,战国和秦是封建化过程的序曲,但秦末农民战争打断了这一

过程。此后不断反复,直到明末农民战争又使清初出现大量的自耕农,因此封建化过程并未结束,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构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内容。

持上述意见的同志认为,西欧封建化的完成,庄园经济取代小农经济,使社会处于新的世代的发展点上。中国由于没有完成封建化,其结果是:一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长期延续下来,工商业自由独立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形成,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科学技术也始终不能很好地发明、利用和发展,这就窒息了唯一能够在封建社会中掀起巨大、根本变革的经济力量(同时也是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封建化没有完成,社会动乱频繁不断,任何微小的社会进步都时时被无情地打断、摧毁,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始终没有完成封建化呢?持此说的同志说,制造这一奇迹的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的小农。自耕农民一方面通过武装起义获得土地,另一方面封建国家从其统治利益出发,也加以扶植,所以不断产生新的自耕农,这就决定了中国封建化过程的长期性和反复性。正因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化进程,并使社

会重新返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中国封建社会就在这样循环轮回中延续下来了。因此,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封建化没有完成的另一原因,是定居在游牧部族生存圈周围的农业社会不断受到游牧部族的侵扰,就必然大体上组成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认为,没有完成封建化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具有典型性,是一种畸形和变态(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周庆基:《论中国封建化过程》,《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王守稼、汪征鲁、许言不同意刘昶的观点和对问题的分析。综合起来,主要是:

第一,封建化的标志应该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确立,或占主导地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实物地租为主要形态,而西欧庄园经济则处于劳役地租阶段,以地租形态而言,中国封建形态较西欧更成熟、更发达。当十世纪西欧封建制确立时,中国已过渡到了封建制的黄金时代。

第二,小农经济是整个封建生产方式方面的内容,无论自耕农、佃农、农奴都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而不管是地主经济或者庄园

经济都是以小农经济经营的,绝对不存在庄园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在中国,一方面是封建地主大规模占有土地,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土地经营,这种基本经济结构的不变,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因此必须从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忽略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会片面。

第三,将封建化与专制集权制视为不相容,是把政体当作国体混为一谈。事实上,君主专制集权制是封建制度发展的必然归宿,是封建社会常见的一种统治形式。

第四,专制集权制长期延续的原因不是所谓“游牧生存圈”,关键性的因素不是外因,不是地理环境,主要是社会内部的生产方式决定的。

第五,每当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动乱时,农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农民起义冲击、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部分,使社会生产力显示出螺旋式发展。中国历史并不是“六道轮回”,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只是发展缓慢(王守稼:《评〈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的若干观点》,《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3期;汪征鲁:《小农经济、封建化及其它》,《福建师大学报》

1981年第2期;许言:《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与所谓“超稳定系统”》,《文汇报》1981年9月14日)。

(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充分发展

程洪、朱孝远、李春辉、王俊义等与前面一种意见截然相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充分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的原因。

程洪认为,中国的高度封建化,完善了封建体制,促使生产力持久发展,比西欧封建领主制具有明显进步色彩。中国封建社会创造的文明,曾给世界历史带来重大影响,推动了世界前进的历程。李春辉、王俊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得极为完整和典型。他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比东西方的封建制度,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孝远说,与中国相比,西欧封建社会只具有初级形态。他从农奴制落后于租佃契约制,西欧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及领主对农民的压迫自然停留在“权力压迫”上,来论说西欧封建制的发展不充分。

高度、充分发展的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又长期延续呢?他们认为,这是与高度封建化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土地关系的不稳定到超稳定。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国家、地主、小农三种土地所有制并存,土地关系相当不稳定,通过土地流转和社会动乱不断调整。这样的不稳定性反映了高度封建化经济的能动性,通过调整,其结果是出现了整个封建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推延了封建社会总危机的到来。

第二,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到稳定。高度封建化的政治结构(不是阶级关系),其基本特征是皇权与臣民的两极化,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三条途径调节。一是利用皇权镇压敌对阶级或通过惩办贪官污吏来缓和矛盾;二是推行“选举”,尤其是隋唐以后的科举,扩大统治基础;三是改朝换代,通过新王朝革去前朝弊政。这类政治上的对流,加强了社会内部的活力,出现了政治结构的超稳定性,推延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第三,统治思想的不稳定到超稳定。中国高度封建化经济的多类型和政治对流,带来了思想的多样化,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道学、理学、心学的更替变幻,使统治思想在不稳定状态下不断更新,以不稳定来实现思想统治的稳定。总之,高度封建化的中国社会具有自发调节,不断运动的活力,从而使社会基

本矛盾缓和下来,化毁灭性的“大震”为无数次“小震”,在不稳定中实现稳定,大大地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寿命(程洪:《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朱孝远:《发展充分化是社会形态长期延续的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李春辉、王俊义:《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求索》1981年第2期)。

(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系列特点的缘故

庞卓恒的观点与前面两种意见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相比之所以长得多,是因为二者之间在形成的历史背景方面,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政体形式、意识形态等等方面,以及专制政权的历史作用方面,都有一系列互不相同的特点的缘故。

从历史背景看,秦始皇正式开端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体,是在夏、商、西周的基地上形成的,主要是以国家编户制下的小农经济为其物质基础。在土地所有制上是封建国家、私家大土地和农民三种所有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所有制体系。西欧封建社会没有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封建所有制体系,而是庄园农奴制下的小农经济和封建等级所有制,从而在政体上先是贵族

民主制、等级君主制；后来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市民向资产阶级转化，至十五、六世纪，西欧各国才先后过渡到专制君主制。由于二者的经济基础不同，决定了阶级结构也不同。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这样单一的封建阶级结构上；而西欧的专制制度则是建立在既有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又有资产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样一种复合的、过渡性的阶级结构之上的。由于上述的差异，二者的历史作用也就极不相同。总的说来，西欧君主专制起了促使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诞生这种特殊作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一开始就把维护自然经济视为保证它的专制统治的命根子，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中国从未出现过城市经济和市民阶级。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与专制的上层建筑相结合的社会结构，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再生力，成为一块“活的化石”（庞卓恒：《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胡寄窗也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较早而瓦解特慢的原因，自有其特殊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与西南

欧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各地又很不平衡。因此，应注意研究封建生产关系量的演变，即封建生产关系的地域扩展。在一个幅员广袤的国度里，当一个支配的生产关系在整个政治地域内尚有充分扩展的条件时，在它的上升阶段会增添其活力，在它的下坡阶段会延长其衰落过程。这是中国封建关系所以能够延续较久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此外，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质、农商结合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等等，都是中国封建经济延续瓦解的重要原因（胡寄窗：《论中国封建经济成熟甚久瓦解特慢的原因》，《经济研究》1981年第6期）。

（四）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是因为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

金观涛说，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控制论是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从整体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都在发生变化，并调整相互关系，尤其是作为最活跃的经济因素的不断发 展，势必导致政治和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相适应。

这时,结构就会变为不稳定,就会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结构。控制论指出,其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新结构代替旧结构,即社会形态的变革。一是在一个大系统内引起整个社会的崩溃,生产力遭到大破坏,经济结构中的新因素遭到杀伤,通过破坏使整个旧结构重新回到适应状态。控制论称后者为超稳定系统,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出现周期性的震荡。中国封建社会有两个重大特点,一是在其结构形态上长期停滞,一是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替。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每隔二百年发生一次周期性崩溃(即震荡)。这种周期性崩溃又是破坏生产力的进步、积累,消灭不稳定因素使社会恢复旧结构的重要调节机制,从而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呈现出结构的巨大保守性(金观涛:《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读书》1981年第11期)。

陈平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但他却是从另一角度来分析这一命题。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而欧洲则是农牧混合经济结构。他从欧洲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政策的比较、生态地理和经济技术结构、农业生产方式对经济文化的影

响、经济结构的稳定和进化度等四个方面,说明无论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或者是农牧混合经济结构,都与地理条件的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历代王朝所实行的商业政策、土地政策、对待技术发明等等,与西欧都截然不同。单纯农业经济是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生产效率、生活水平都极端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整体,抗拒任何外来的新鲜事物和内部的自然改革。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专制的封建制度和落后的经济结构,阻碍了技术的传播和生产的进步,使经济活动简单、低能、分散、守旧,因而也就只能在必然的王国中挣扎了(陈平:《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

(五)讨论中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

主张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充分发展的朱孝远和程洪,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发展充分的社会形态都是长期延续的社会。

他们认为,东西方历史运动的轨迹表明,在西方是奴隶社会充分发展,但封建社会发展不充分,其

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又迟迟没有实现。在东方是奴隶社会发展不充分,但封建社会发展充分而又特别长,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但社会主义又较早实现。这种带有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说明了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都是长期延续的社会。这是因为,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能够通过社会内部的调节,给生产力的发展留下更大的余地,同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又往往使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维护旧方式国家机器的物质基础;其次,充分发展的社会形态一般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增加了社会变革的艰巨性。反之,相对不发达、僵化的社会形态,由于社会内部不能自行调节,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就小,社会矛盾就难以在社会内部得到调整,势必较早地出现变革。其次,社会变革总是在薄弱的一环首先实现。社会变革不能脱离生产力的发展,但革命往往不是在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成功。因此,发达转化为落后,僵化转变为先进,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程洪:《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朱孝远:《发展的充分化是社会形态长期延续的原因》,均见《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

此外,有的文章不是从中西方封建社会的对比来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而是从中国封

建经济结构来论述这一问题。方行从生产上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流通上是地方市场在城市和农村的普遍存在、在分配上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方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农民战争问题

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1981年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的中心是关于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的问题。

在以往的讨论中,对封建时代农民的平均主义褒多贬少,基本上是肯定的。近年来,有的同志认为应该一分为二,有的同志则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1980年,董楚平发表了《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同志撰文商榷。1981年,董楚平发表了几篇答辩性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少同志也撰文辩难。争论较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平均主义的性质和作用

董楚平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劫财”和“义舍”、“圣库制度”等,前者是均分封

建国家和部分地主财富为己有，后者是在人民内部财互助。平均主义有“破”的功用，但当革命进入高潮，将其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生产时，它就好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因此，从平均主义到封建主义，从农民政权到封建政权，这种转化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并且转化愈快愈好。关键是要转得好，这就是要革除一些弊端，保卫小农经济，发展生产力等等。《天朝田亩制度》不是颁布于金田起义前后，而是颁布于定都天京之后，因而是反动的。如果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的农村非爆发农民起义不可。太平天国的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与其接受平均主义的“理想光辉”，还不如接受封建主义的剥削。一个最粗糙的窝窝头，也比最漂亮的画饼更有用。所以农民领袖搞封建主义，不搞平均主义，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他道路是没有的（董楚平：《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

林衍经、王界云、郭毅生、陈梧桐等不同意见以上观点。他们的意见综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平均主义是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所受深重剥削、为求生存的一种阶级本

能要求。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由经济上的分产、均产发展为均分土地的斗争纲领。第二，平均主义无论是在农民起义的前期或后期始终是有力的武器，而不是如董文所说只在早期起了动员群众的作用。第三，马克思主义说平均主义是反动的，乃是指反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用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而言；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平均主义则是革命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平分土地式的平均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充分的革命性。第四，关于“画饼”。平均主义虽然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它反映了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农民的小土地经济，这是现实的、必要的，并不是空想。当然，平均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第五，农民领袖在起义之初一般对传播平均主义的主张十分虔诚，一旦斗争取得胜利，地位发生变化，小私有的观念急剧膨胀，在封建意识的影响下，便会逐渐抛弃平均主义的旗帜。农民领袖的封建化演变过程，就是农民起义失败的过程。对广大农民来说，作为小私有者，为了“一小块土地”，往往半途而废，不愿斗争到底，致使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王界云：《平均主义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人文杂志》1981

年第3期。《论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林衍经：《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撮论》，《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郭毅生：《天朝田亩制度的经济背景及其性质》，《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陈梧桐：《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

（二）平均主义和封建特权

董楚平认为，农民领袖往往一开始就向往富贵（如陈胜说“苟富贵，毋相忘”。李自成说“从我可富贵”），这种“富贵”思想既是反抗的革命思想，又是剥削思想。因此，向封建主义转化是农民战争的内在规律。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结有不解之缘，平均主义的战旗是缚在特权主义的旗杆上的，否则就“揭”不起来。平均主义冲击着旧的封建特权，却掩护着新的特权的成长。广大农民拥护封建特权，一是因为小生产者经济力量薄弱，要有人格化的神这种超人力量的保护，一是家长制习惯势力的影响（董楚平：《论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与封建特权主义》，《学术月刊》1981年第1期；《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求是学刊》1981年第2期）。孙叔平也认为，从农民的“均贫富”中产生新富，从农民的“等贵贱”中产生新贵，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孙叔平：《谈谈农民的历史作用》，

《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

林衍经不同意上述意见。他认为特权和特权主义是伴随私有制产生的。在封建社会，形成了封建等级特权制，法律规定了地主阶级的特权地位。封建特权都是以私有财产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根本上铲除封建特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民“等贵贱、均贫富”就是对“谁有地，谁就有权有势”这种封建特权的冲击。平均主义一开始就是作为农民革命思想来反对封建特权，是势不两立的世仇。对董文所举农民拥护特权的两点理由，林衍经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第一，黄巢、李自成都是在平均主义战旗下开展斗争，而没有“超人力量”保护的痕迹；第二，家长制的影响不同于君主专制的特权，前者是作为家庭的一员并且是基于伦理关系，后者则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至于农民领袖利用天命和宗教迷信，这是中世纪“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外衣出现”，而不是农民领袖大搞封建特权提供神学根据（林衍经：《论封建特权主义与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

（三）平均主义与农民战争的实践

董楚平认为，中国历史上千百